

“先富能人治村” 视域中的村民公共参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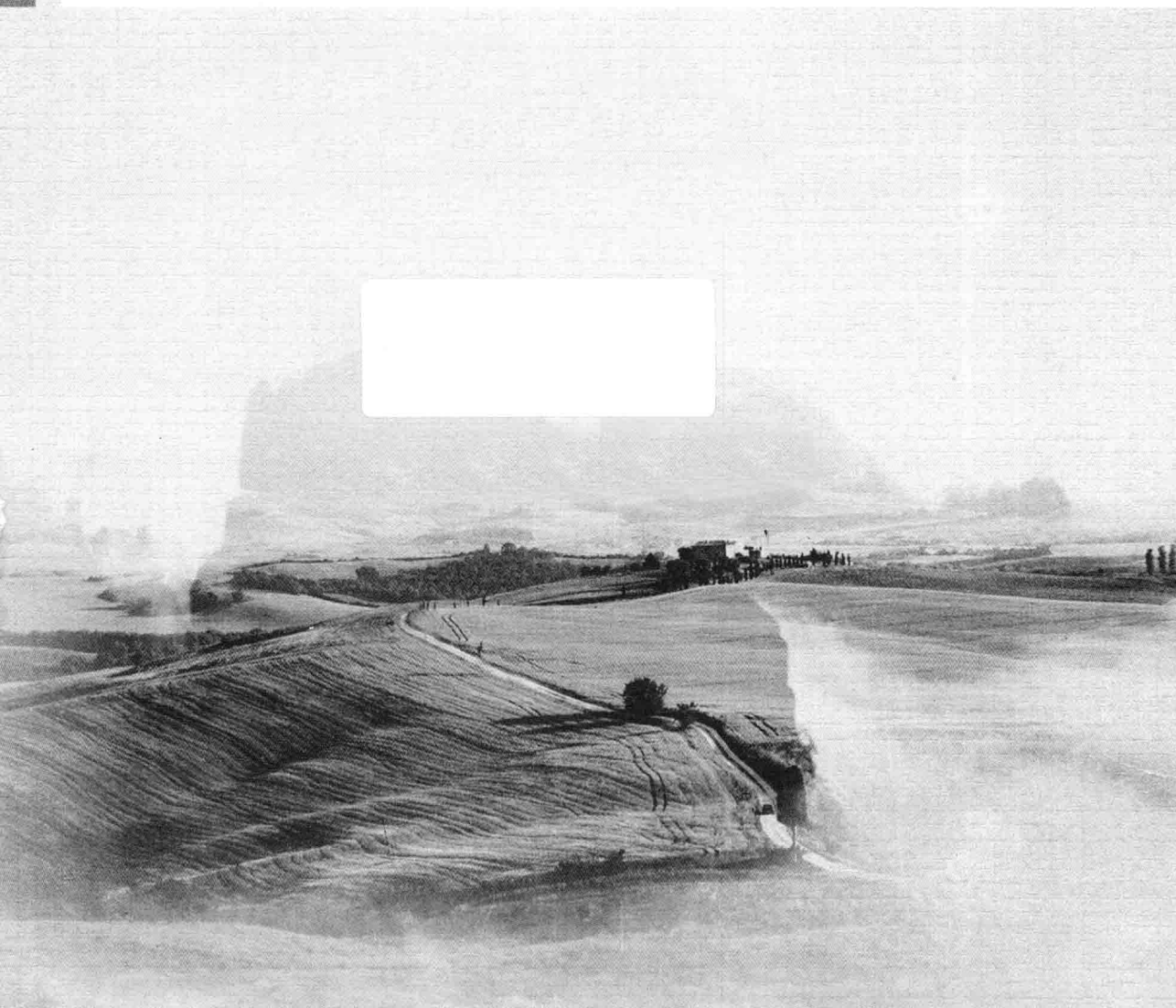
XIANFU NENGRN ZHICUN
SHIYUZHONG DE CUNMIN GONGGONG CANYU

裘斌◎著

“先富能人治村” 视域中的村民公共参与

XIANFU NENGEN ZHICUN
SHIYUZHONG DE CUNMIN GONGGONG CANYU

裘 斌◎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先富能人治村”视域中的村民公共参与/裘斌著.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7
ISBN 978-7-308-13348-7

I. ①先… II. ①裘… III. ①农村—群众自治—研究—中国 IV. ①D63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18707 号

“先富能人治村”视域中的村民公共参与
裘斌著



策划者 何瑜(wsheyu@163.com)
责任编辑
封面设计 杭州林智广告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148号 邮政编码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杭州林智广告有限公司
印 刷 富阳市育才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11.25
字 数 233千
版 次 2014年7月第1版 2014年7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13348-7
定 价 36.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联系方式:(0571) 88925591;<http://zjdxbs.tmall.com>

本书获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题名：“先富能人治村”
对村民公共参与的影响及对策研究，批准号：12YJAZH105）项目资助，
谨致谢忱！

绍兴文理学院
出版基金资助

前言

迈入新世纪以来,随着村民自治的推进,“先富能人治村”现象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早在十年前,由纪圣麟等人完成的一项针对浙江农村的调查表明,2002年,浙江省近四万个村委会完成第六届换届选举后,全省新当选的133222名村委会成员中,先富能人约占30%,而在浙江省义乌市2726名村委会成员当中,先富能人当选比例高达60%,在新当选的421名村委会主任中更是占到65%。永康、东阳、瑞安、乐清等地,先富群体当选村委会成员的比例也都在60%左右。^①时至今日,“先富能人治村”成为我国不少农村地区一道越发亮丽的政治风景线。陈锋在2010年调研浙东地区一个乡镇时发现,该镇70%的村支书和村主任由先富能人担任。^②我们在浙江省嵊州市新近所作的调查也发现,先富能人担任村干部的现象比比皆是。

村民公共参与,作为衡量农村基层民主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近年来日益受到党和政府有关部门的重视。胡锦涛在党的十八大指出:“在城乡社区治理、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中实行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是人民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权利的重要方式。要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以扩大有序参与、推进信息公开、加强议事协商、强化权力监督为重点,拓宽范围和途径,丰富内容和形式,保障人民享有更多更切实的民主权利。”^③可见,积极推进乡村基层的村民公共参与,是现阶段新农村建设工程中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我国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

鉴于此,在当下,认真探讨村民自治运作中的公共参与及其推进思路,既是党和政府有关部门的职责,也是乡村治理理论工作者责无旁贷的任务。特别是当乡村治理嵌入“先富能人治村”这个变量以后,村民公共参与将呈现出怎样的运作态势?“先富能人治村”将给村民公共参与带来怎样的影响?先富能人治理下村民公

^① 纪圣麟,周炳泉,陈军:《先富群体竞选村官现象调查》,《乡镇论坛》2003年第8期。由王信川等人完成的一项调查则表明,在第六届选举后担任村委会主任的763人中,办厂、经商的有480多位。详见王信川:《义乌老板们的村官仕途》,《经济月刊》2003年第11期。

^② 陈锋:《富人治村易提高参政门槛》,参见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11年11月2日报道(网址: <http://theory.people.com.cn/GB/16108007.html>)。

^③ 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求是》2012年第22期。



共参与的发展走向如何?我们认为,这些都是理论工作者当下需要关注的重要研究课题。

从理论上而言,认真探讨上述诸问题,可以进一步拓展对“先富人治村”的考察和分析。村民自治强调在村级管理中村民群众的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注重在选举、决策、管理、监督各个环节中民主实践的贯串。而“先富人治村”将对村民自治的全过程带来深刻的影响。因此,如果以“先富人治村”对村民公共参与的影响为考察视角,立足于实证调研,将能进一步拓展对“先富人治村”的多维理论研究。同时,由于理论界对具体村治模式及背景下村民公共参与的专题研究尚不丰富,因此,如果能对“先富人治村”背景下村民公共参与的运作和优化展开细致的实证考察和理论分析,可以有效深化村民自治运作中公共参与的理论研究。

从实践上来说,认真考察和研究经济能人治理背景下村民公共参与的发展态势,将有助于有关部门对“先富人治村”有一个更全面的认识。近年来,学界和政界对“先富人治村”持乐观态度的居多。而现有的实证研究表明,“先富人治村”给村庄治理和建设带来的影响是多向度的。因此,如果能在区域性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全面分析“先富人治村”对村庄民主政治发展的多重影响,对有关部门全面把握先富人主政下的村民自治发展走向是不无裨益的。其次,本项研究也有助于有关部门对“先富人治村”背景下村民公共参与的正确指导。现在,“先富人治村”现象越来越受到各方面的关注。最新的数据则表明,浙江省 2/3 的村是“富人治村”。因此,分析先富人治理下村民公共参与的发展态势与推进对策,对于促进农村基层民众的有序政治参与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

目前,关于“先富人治村”背景下的村民公共参与,学者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先富人治村”对村庄权力结构的影响以及村民在村治中的地位。

随着村民自治的推进与发展,“先富人治村”现象的不断涌现。这一现象逐渐受到部分农村理论工作者的关注。徐勇等学者对不同经济背景下能人型村治模式的权力结构作了较为细致的个案研究。^①董明等注意到“先富人治村”使得村域政治的自主性得以增强,并促使村庄内部以及它与乡镇政府之间的关系发生着嬗变。^②胡序杭则认为,先富人主政既提高了村庄权力结构的合法性,又影响到村级权力结构的稳定性。^③华农心等认为,经济能人型村治模式主要依靠能人的

① 请参见徐勇:《由能人到法治:中国农村基层治理模式转换——以若干个案为例兼析能人政治现象》,《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4期;卢福营:《村委会选举中私营企业主的竞选行为》,《学习与探索》2009年第2期。

② 董明:《再析先富参政现象的生成背景》,《湖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8年第12期。

③ 胡序杭:《先富人争当村官与村级权力结构的稳定性》,《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07年第3期。



超凡能力,突出能人的特殊作用。同时,该村治模式也存在自身难以超越的缺陷。如村民群众对能人的依赖,对治村能人缺乏必要的监督与制约,等等。^①

二是“先富能人治村”背景下村民公共参与的特点与面临的挑战。

有学者发现,在集体经济发达的村庄,村民大规模的群众性参与往往是动员和组织的结果;而在个私经济发达的村庄,出于维护和扩大自身利益的动机,村民的参与大多是自觉自愿的。^② 杨小柳等通过对集体经济型村庄与散户经济型村庄的比较,也得出了基本一致的结论。^③ 赵晓峰等针对“富人治村”存在的对普通村民公共参与的排斥机制,认为此问题应引起高度关注。^④ 陈锋等也指出,富人村官“以私济公”的村务管理手段在使村民获益的同时,也排斥了普通村民的参政。^⑤ 龚博君认为村庄的去集体化将导致“老板村官”“个人化自由政治空间”的膨胀。^⑥ 万慧进等指出能人治村主要问题在于普通村民参与的不足,致使村民自治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异变。^⑦

三是“先富能人治村”背景下村民公共参与发展的思路。

针对先富能人治理下村民公共参与存在的问题与不足,郭正林强调了提高村民公共意识对推进公共参与的重要性。^⑧ 黄俊尧等则认为,农民的参与需要有一个制度平台,这个平台就是村务公开。^⑨ 张小劲、应小丽等指出,协商民主取向的村民公共参与制度创新,是破解部分乡村治理困境的有益尝试。^⑩ 贺雪峰则指

① 华农心:《一个应引起重视的政治现象——中国农村能人政治分析》,《前进》1997年第3期。

② 卢福营:《村社区公共权力的监督——兼以浙江省的两个村为例》,《社会主义研究》2000年第4期。

③ 杨小柳:《乡村权力结构中的经济能人型村治模式》,《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

④ 赵晓峰:《富人治村的社会吸纳机制及其政治排斥功能——对浙东先锋村青年农民精英治村实践的考察》,《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2010年第4期。

⑤ 陈锋:《富人治村易提高参政门槛》,参见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11年11月2日报道(网址: <http://theory.people.com.cn/GB/16108007.html>)。

⑥ 龚博君:《苏南农村政治精英的转型及其伦理困境》,《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

⑦ 万慧进:《“先富能人”担任村书记的绩效、存在问题及其对策》,《中州学刊》2007年第3期。

⑧ 郭正林:《卷入民主化的农村精英:案例研究》,《中国农村观察》2003年第1期。

⑨ 黄俊尧:《论村民代表会议与“先富群体治村”》,《浙江学刊》2009年第2期。

⑩ 张小劲:《民主建设发展的重要尝试:温岭“民主恳谈会”所引发的思考》,《浙江社会科学》2003年第1期;应小丽:《协商民主取向的村民公共参与与制度创新——浙江省常山县“民情沟通日”制度调查与分析》,《浙江社会科学》2010年第2期。



出,在“富人治村”背景下,大力发展基层民主,是推进乡村治理和建设的基本思路。^①

国外学者如塞缪尔·P. 亨廷顿、蒲岛郁夫等,在公民政治参与方面提出了不少重要观点和思想^②,这无疑为本项研究提供了较好的理论支撑。

然而,由于受到研究视角、样本、力量等各种因素的制约,目前理论界对“先富人治村”背景下村民公共参与的研究尚有待于拓展和深入。

一是对先富人治理下村民公共参与的研究面有待于拓宽。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对个私经济、集体经济发达背景下的能人型村治研究。对先富人治理下不同社会关联度的村庄、不同村治规模的村庄、不同经济基础的村庄等的村民公共参与运作态势及发展情况的研究尚有待于拓展。

二是对先富人治理下的村民公共参与专题研究有待于深化。目前的研究主要是在对能人型村治模式进行考察的同时,对能人治理下的村民公共参与作了相应分析。因此,关于“先富人治村”对村民公共参与的多重影响及相关对策的专题研究亟待深化。

我们认为,随着党和政府对“先富人治村”现象和对发展农村基层村民有序公共参与的日益重视,关于先富人治村背景下促进村民公共参与的研究和探讨将会受到更多理论工作者的关注。

针对目前理论工作者的研究现状,本书试图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对于“先富人治村”背景下的村民公共参与问题展开更为深入系统的考察和研究。首先,笔者在本书中准备系统考察“先富人治村”背景下各阶层村民公共参与的运作态势。十多年来,我们始终关注“先富人治村”这一乡村政治现象,并结合相关课题研究,对此现象作了不少调研与思考,发表了“能人治理型村庄的政治信任基础”、“能人治理下普通村民公共参与的非均衡性”等论著。^③但研究还是较为初步的,对能人治理下村民公共参与的考察仅是局部的。我们计划在本书中对“先富人治村”下村民公共参与的运作态势作一更为系统的调研与考察。“先富人治村”这个变量的嵌入,对村民公共参与到底带来了怎样的影响?其深层次原因何在?我们希望通过对上述问题的研究能获得更明确的思路。

其次,笔者在本书中准备更深入探讨“先富人治村”背景下村民公共参与的推进策略。贺雪峰认为,当下,先富人治村不仅是一个重大的经验现象,而且涉

^① 贺雪峰:《论富人治村——以浙江奉化调查为讨论基础》,《社会科学研究》2011年第2期。

^② 参见塞缪尔·P. 亨廷顿:《难以抉择: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参与》,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版;蒲岛郁夫:《政治参与》,解莉莉译,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

^③ 袁斌:《能人治理型村庄的政治信任基础》,《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11年第2期;《能人治理下普通村民公共参与的非均衡性》,《天津社会科学》2011年第3期。



及乡村治理的基本走向,是一个重大的政策问题。^①近年来,如何促进“先富能人治村”背景下乡村政治发展和社会稳定?如何更主动地应对先富能人治村下村民公共参与面临的挑战?如何将“先富能人治村”和基层民主政治发展更有机地结合起来?是我们一直在探索的问题,然而,这些问题尚有待于进一步探索,我们计划在本书中进行更为系统的探讨。

在研究样本的选择上,我们坚持典型性与客观真实性相结合。注重调研样本的代表性,我们通过与当地政府部门的相关同志协商,选择浙江省嵊州市若干个比较典型的“先富能人治村”型村庄展开全面的实证研究。同时,注重样本的客观性和调研数据的真实性,在保证案例分析达到一定数量的同时,确保采集信息、搜集资料的客观真实性。在本项研究中,我们重点考察的样本村^②有四个,它们是嵊州市浦口街道的俞村、棠村和剡湖街道的张村、何村。

俞村,位于嵊州市经济开发区浦南大道东侧,全村 1155 人,426 户,有党员 49 名,设有 2 个党小组,5 个村民小组,有村民代表 42 名,村两委会班子共 5 名。俞村现有各类存款近 3000 万,2010 年村级集体经济收入 198 万,村民人均收入 15000 元。俞村是省级文明村、省级体育特色村、绍兴市级小康村、绍兴市卫生村和嵊州市文化示范村。该村的村主任是村中为数不多的颇有实力的私营企业主之一,企业资产超过 1000 万元。该村的村支书也办过不少企业,拥有较强的经济实力,并积累了丰富的企业管理经验。

棠村,位于嵊州市经济开发区浦南大道东侧,有 1088 户,包括 18 个村民小组,98 名党员,6 个党小组,6 个村委,7 个支委,总共 9 人。2002 年 11 月,该村被依法征用土地后,村民全部农转非,现在村里土地被征用的款子,安置费给了老百姓,征用费存在开发办,有 4000 多万,每年拿利息。2009 年村集体经济收入 320 万元,人均纯收入达 8256 元。由于过去前任领导班子闹分歧,管理混乱,工作几乎陷入瘫痪,村民纷纷向上级部门上访,一段时间成为全市“重点矛盾村”。但自从换届选举以来,棠村党支部、村委会新官上任,精神面貌焕然一新。该村的村主任是一位跑建筑工程的老板,资金实力雄厚。村支书家里则办有领带加工厂,企业由他和妻子共同打理,每年收入颇丰。

张村,由原来的董泽、张树两个自然村合并而成,全村现有 363 户,人口 1060 人,总区域面积 1.79 平方公里,被征用土地 570 亩,现有耕地面积约 214.7 亩,山林 286 亩。张村紧邻环城公路,距嵊州市政府约 3.5 公里,交通十分便捷。现在村里绝大部分村民都建起了新房子,2012 年度村民人均收入达 14605 元。张村在 2008 年被评为嵊州市全面小康建设示范村,2009 年被评为省级平安农机示范村,

^① 贺雪峰:《富人治村与“双带工程”——以浙江 F 市农村调查为例》,《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2011 年第 3 期。

^② 根据学术惯例,本书中对文中涉及的有关村名和人名作了相应的技术处理。



2010年被评为绍兴市级民主法治村、浙江省级农村信息化示范村。村支书办有一家金属冷拉型材公司,经济实力雄厚,现有资产约1.5亿,年产值也达到1亿元以上,其企业位居嵊州市百强企业,他本人是嵊州市人大代表。村主任则办有一家石材加工厂,其产品主要用于高速公路及建材方面,资产有三四千万。

何村,位于嵊州市城北经济开发区,属于嵊州市剡湖街道,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捷。全村共有村民521户,1352人,党员79人,其中,劳动力854人,从事农业劳动50人,外出务工420人。2011年村级集体经济收入为229万元,主要来源于标准厂房、综合楼等的出租和个私集聚区土地使用租金的收入等,农民人均收入达到12437元。近年来该村被评为省级小康示范村、省级农村新社区、省级科普示范村、省级党风廉政建设示范村等。村主任办有一家包装用品加工厂,资产上千万。村支书主要从事房产投资业,经济实力雄厚。

在研究方法上,我们试图采用实证研究和理论分析相结合的方法,立足于样本村的考察与分析,对于先富能人治理下的村民公共参与进行综合研究。在具体研究中突出“实际”、“实证”,通过社会调查和案例分析得出客观的结论。在考察环节上,坚持全程观察与重点考察相结合。即在对“先富能人治村”背景下村治运作的全过程作认真分析的同时,重点考察村民选举、村务决策、村务监督等环节的村民公共参与。在分析视角上,注重由内而外与由外而内相结合。我们通过蹲点村庄,驻村观察,力求从内部考察村治的运作。同时,我们又以调查者身份与村干部、村民群众通过问卷调查和访谈等方式,试图获得更全面和更客观的资料。

之所以采取这种立足于村落社区的研究和分析方法,是因为我们觉得中国的乡村治理实践永远处在“进行时态”中。费孝通先生认为,“以全盘社会结构的格式作为研究对象,这对象并不能是概然性的,必须是具体的社区,因为联系着各个社会制度的是人们的生活,人们的生活有时空的坐落,这就是社区”^①。作为研究者,只有扎根于村庄田野调查,才能更真切地了解乡村治理的实际情况。对于我们来说,也只有立足于田野考察,才能深入洞察“先富能人治村”背景下村民公共参与的现状和发展走向。应该指出的是,“先富能人治村”下的村民公共参与是一个非常丰富的考察范畴,我们所分析和探讨的充其量只不过是冰山一角,“先富能人治村”背景下涌现出来的更多现象和问题,尚有待于乡村治理研究者从多个维度作出进一步的实证考察和理论探索,这是需要说明的。

^① 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94页。

目 录

MULU

第一章 先富能人的崛起和“先富能人治村”的形成	(1)
一、先富能人崛起的政策背景、物质基础和发展空间	(1)
二、“先富能人治村”现象的形成和发展	(5)
第二章 “先富能人治村”对村庄权力结构及其运作的影响	(16)
一、“先富能人治村”背景下的村庄公共权力结构	(16)
二、“先富能人治村”背景下村庄权力运作的特征	(24)
第三章 “先富能人治村”所导致的村民公共参与变迁	(33)
一、乡村政治信任重建中的村民公共参与	(33)
二、能人治理型村庄的政治信任基础	(41)
三、能人治理背景下村民公共参与的变迁	(49)
第四章 “先富能人治村”和普通村民公共参与的非均衡性	(64)
一、能人治理背景下普通村民公共参与非均衡的表现	(64)
二、能人治理背景下普通村民公共参与非均衡的原因	(69)
三、促进普通村民公共参与均衡发展的重要思路	(77)
第五章 “先富能人治村”和非治理精英的公共参与	(81)
一、“先富能人治村”背景下的非治理精英	(81)
二、“先富能人治村”背景下非治理精英的公共参与	(86)
三、非治理精英、治理精英、普通民众多元博弈下的村庄政治	(90)



第六章 “先富能人治村”背景下村民公共参与发生变迁的原因	(94)
一、村民公共参与发生变迁的政治原因分析	(94)
二、村民公共参与发生变迁的经济原因分析	(99)
三、村民公共参与发生变迁的社会文化原因分析	(104)
第七章 “先富能人治村”背景下促进村民公共参与的对策思考	(108)
一、促进“先富能人治村”背景下村民公共参与的对策思考	(108)
二、“先富能人治村”背景下村民公共参与的发展走向展望	(119)
参考文献	(123)
附 录 访谈实录	(128)
索 引	(163)
后 记	(167)

◆◆◆ 第一章 ◆◆◆

先富能人的崛起和“先富能人治村”的形成

一、先富能人崛起的政策背景、物质基础和发展空间

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中一个令人瞩目的新气象是,一批经济能人凭借国家开放、搞活的新政策,通过合法经营和诚实劳动率先富起来,成为令人羡慕的先富能人。^①在农村中崛起的先富能人成为乡村基层一支重要的经济和社会力量,并对农村基层政治生活的稳定和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一) 先富能人的内涵及其构成

1. 先富能人的内涵

在笔者看来,先富能人是有其特殊的内蕴的。众所周知,在农村中,能者济济,能者之所以为能,是因为其在某一方面或某些方面的能力特别强,超过了一般的人。在农村中,这样的能人是很多的。有的在政治方面有高人一筹的敏感性和领悟能力,在理解和贯彻上级的政治意图和有关路线、方针政策方面有过人的禀赋,这样的人通常能特别得到上级的青睐及信任,往往被委以有关职务,是谓政治能人也。有的在文化方面出类拔萃,或是乡村中小学的民办、代课教师,具有较高的文化程度,因高考失利或经济困难等原因而放弃了继续深造,选择了在乡村培养农家子弟;或是乡村合作医疗机构中的农民医生,通过传承父业或自学成才,担当起为父老乡亲看病抓药的重任,等等,是谓文化能人也。有的在生产投资或经济管理领域具有超凡的能力,善于捕捉经济信息、敢于投资新兴产业、精于产品推销和成本核算,他们在改革开放以前高度集中的农村社会管理制度下是舒展不开手脚

^① 鉴于改革开放以来,先富能人群体已成为农村基层最主要的能人群体,在本文中,“先富能人”亦称为经济能人,或者简称为能人;“先富能人治村”有时亦称为“能人治理”,相应地,主政村庄治理的先富能人亦称为“治理能人”。



的,但是在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农村基层经济和社会管理权力的下放,他们在商品经济浪潮中奋力搏击,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闯荡和发展空间,他们依托国家改革开放的政策,大力发展规模化经营,积极投身非农产业,凭借自己的胆魄、能力以及吃苦耐劳的精神,在农村发展市场经济的浪潮中挣得“第一桶金”,率先富裕起来,是谓经济能人也,也即是本文中所指的先富人。

2. 先富人的构成

先富人的出现和崛起是离不开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农村社会改革开放这个重要的政策背景的。同时,“条条道路通罗马”,随着农村改革的推进和开放的深入,经济能人可以根据自身的兴趣、爱好和能力基础,选择最适合自身特点和家情、村情、乡情的不同致富道路,从而使得当今农村的先富人有其丰富的构成。关于这个问题,已有学者结合调查研究作了较为全面的考察,^①笔者在吸收有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针对现阶段农村先富人构成的实际情况,作一比较系统的梳理和分析。笔者认为,在当今的农村社会,先富人主要由农村私营企业主、农村个体工商户、农村专业大户以及乡村集体企业管理者等几类人构成。

(1) 农村私营企业主。所谓农村私营企业主,是指利用自有的生产资料和生产工具,雇用员工数人,兴办或者经营有一定规模的企业的农村经济能人。他们往往见多识广,具有卓著的经营管理才能,拥有颇为丰厚的经营收入,是农村基层社会中最引人注目的先富人,也是农村市场经济发展中的弄潮儿、带头人以及最大的受益者。他们兴办及经营的企业既在量上有一定的优势,彰显出可观的规模效益,又不至于庞大到像不少国有企业那样缺乏灵活性,由于他们对瞬息万变的市场反应敏捷,及时决断,因此往往能够取得较好的经济效益。

案例: 华某,浙江省嵊州市溪滩村人,是 20 世纪 80 年代村办集体企业的员工,该村办集体企业主要业务是为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兴起的一家大型家电企业提供配套的标牌生产业务。80 年代末,他从集体企业中来自办私营企业,其主业依然是为家电企业提供配套的标牌生产。华某为人低调,精明能干,通过努力,他与位于杭州的西湖电子集团建立起了稳定的业务关系,生产得到迅速发展,经过多年的积累,其资产已经拥有上千万。

(2) 农村个体工商户。所谓农村个体工商户,是指主要利用自有生产资料和生产工具,依靠自身及家庭劳动者,从事工、商服务行业或其他某些专业劳动的个体工商户。在改革开放以来,政府一反从前那种对个体经济动不动就限制甚至禁绝的做法,对于个体工商劳动者给予积极引导和大力支持,使之成为繁荣农村经济的一支重要生力军。同时,当前农村社会中的个体工商业者呈现出多元化、

^① 请参见卢福营:《论农村社会转型中崛起的经济能人群体》,《浙江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 年第 5 期;华农心:《一个应引起重视的政治现象——中国农村能人政治分析》,《前进》1997 年第 3 期。



多层次的特征,既有爬摸跌打、维持基本生计的商贩和工匠,也有经营成绩斐然、收入可观的个体工商大户,我们所指的显然是后者。

案例:雷某,浙江省嵊州市湖村人,早年参军,退役后被安排到一家乡办的制冷机械厂工作,后因工厂经营效益等原因,离开单位自谋出路。他看到自己村庄不少村民在农闲时利用家庭劳动力生产的榨面很受市场欢迎,觉得是个不错的创收路径。于是,他刻苦学习榨面加工技术,开始举办家庭榨面加工厂。由于他善于钻研,注重推销,加工榨面的技术日益精湛,加工的榨面很受市场欢迎,生产规模不断扩大。现在已成为嵊州市城关镇不少面食经销店的榨面供应商,通过多种经营,他自己也积累了可观的财富,资产已有数百万元。

(3) 农业专业大户。所谓农业专业大户,是指主要依靠家庭成员或雇请少量帮工,通过承包大片耕地、山林、果园、水面,或者举办家禽、牲畜、水产养殖场,实行专业化、规模化农副业生产的农村村民。他们往往具有较高的文化技术水平、较强的经营管理能力,以及商品市场意识,是真正依托农业富起来的新一代农民。

案例:金某,浙江省嵊州市赵村人,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凭借政府的政策支持,他大力发展生猪的规模化生产,取得了可观的经济效益,已有家产数百万元。近几年来,他针对生猪销售价格波动较大,获利难以保证稳定性预期的情况下,采取了不少举措,努力将生猪养殖产业做大做强做高,并同该市的肉类加工厂建立了紧密型的合作关系。由于经营成绩卓著,在当地颇具威信,是该市的人大代表。

(4) 乡镇集体企业负责人。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获得国家政策支持鼓励和扶持的乡镇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地异军突起。乡镇企业一开始就面临着市场的洗礼和竞争的考验。其原料和产品均经由市场获得或销售,其员工一般是离土不离乡的农民,在其与国有大中型企业的竞争中,在原料、市场、技术、资金等方面都处于不利的地位。出于竞争和生存的需要,被推举为乡村集体企业管理者的往往是农村中那些在经营管理方面具有过人禀赋的经济能人。乡镇集体企业通过市场浪潮的洗礼,一部分生存环境越来越艰难,甚至步入倒闭、歇业的窘境;另一部分则在企业管理者的引领下,爬摸跌打,闯出一条生路,一步一步地发展壮大起来。而这些企业的管理者本身也在激烈的竞争中进一步磨炼了自己的意志力,提升了自身的风险意识和经营管理能力,并在企业运作中因其辛劳的付出和卓著的经营成效,而获得了可观的酬劳,成为农村中先富能人的构成部分。

案例:王某,浙江省嵊州市泥村人,年轻时即表现出非凡的领导和组织能力,长期担任村团委书记,后来被推举为村办机械厂的负责人。他不辞劳苦,率领村民艰苦创业,企业获得不断发展,并取得可观的盈利,在积累集体资产和安排村庄闲置劳动力方面作出了很大贡献。后来,他又被推选为村党支部书记,通过他的积极争取,他所在的村庄获得了上级有关部门关于农村小康示范村的资金和政策支持,通过努力,依托该村自有资金以及上级部门的配套支持,有步骤地实施村级发展规



划及设施改造,村容村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该村进入嵊州市首批省级小康示范村的行列,他自己也当选为嵊州市政协委员。

(二) 先富能人崛起的背景、基础和发展空间

先富能人的崛起既离不开自身的努力和禀赋,也离不开改革开放以来的政策背景、物质基础和前所未有的发展空间。

1. 农村基层治理机制的变迁

1958年开始,中国农村逐步构建起来的人民公社管理体制,表现出工、农、兵、学、商一体,高度集中、政经合一的特点。其基本特征是“一大二公”,“大”即规模大,动不动数千上万人;“公”则是强调生产资料上的公有性质,在建立初期还一度作过生产资料全民所有、产品分配实行供给制的尝试,在分配上呈现出非常严重的平均主义的色彩。虽然后来由于中央的重视,通过调查研究和实践,最终确立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产品分配机制,使劳动产品分配上的平均主义问题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但由于“包产到户”一直被视为不能碰触的禁区,使得生产队中人与人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始终没法消除。在“大家一样穷”的社会背景下,少数人发展个体经济的努力通常被视为资本主义因素的复苏而被毫不留情地压制。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发端于农村的改革开放的主要内容是权力的下放和政、经、社合一的高度集中的人民公社体制的解体。随着以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务为特点的村民自治制度的推行,农村基层干部和广大群众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经营管理和发展生产的自主权。村民们不仅可以自由流动,而且可以自主选择经营的品种、投资的产业以及生产的组织方式,同时拥有了自身独立的经济利益,这成为先富能人得以崛起的一个重要原因。

2. 市场经济的发展和非农产业的异军突起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家逐步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在农村基层,“改革、开放、搞活”成为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中大家耳熟能详的主题词。农村中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突破了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框架和经济结构,打破了行业、区域、城乡之间的限制,拓展了农村基层经济能人的活动空间,经济能人的关系网络也得以相应地扩大。另一方面,伴随着农村基层的改革和政策的变化,村镇企业和个私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从而造就了一批善闯荡、敢冒险的新兴经济精英。

3. 政府支持和农村社会价值观念的变化

在先富能人的崛起过程中,政府的支持是一只看得见的手。改革开放以来,国家选择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发展战略,使农村中的规模化经营和非农产业的发展,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政策支持。而国家“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经济发展战略则消除了经济能人大胆追求财富的思想负担。他们开始“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和所在农村地区的发展基础,在市场经济浪潮中自由搏



击,取得了可观的经济效益。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长期以来形成的“越穷越光荣”的传统价值观念被大胆追求个人富裕的崭新理念所取代。“富”不再被忌讳,而成为能力和本事的象征和体现。在这样的背景下,缺乏市场经营知识和二、三产业经营经验的普通农民特别羡慕那些有眼光、信息灵、会经营的经济能人。如此,经济能人的崛起获得了农村民众普遍的价值认同,这成为经济能人们进一步博取财富的动力,成为“又富又光荣”的先富能人。

(三) 农村先富能人崛起的意义

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先富能人的崛起,是一件影响深远的事情,并在很大程度上推进了农村社会的发展、经济的增长和村民群众的共同致富。

1. 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

抓住了农村改革开放机遇的经济能人既是市场经济的弄潮儿,又是个人致富的先行者。他们信息灵、技术精、会经营、懂管理。在他们身上,既体现出一股务实作风和效益意识,又洋溢着一种不畏艰辛的闯劲和不满足于现状的创劲,因此,他们身上映照出新时代的精神和现代人的素质。正是在他们的推动和引领下,农村的经济发展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活力。

2. 推动了村民群众的共同致富

党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实际上是农村经济发展的一种路径选择,其最终目的是通过先富带后富,最终走向共同富裕。从农村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来看,党和政府的这项工作正在日益彰显出其推动村民群众走向共同富裕的积极意义。先富能人在市场浪潮搏击中获得的成功和取得的收益在广大村民群众中取得良好的示范效应,同时不少先富能人富了不忘乡亲,他们通过向村庄捐资、向村民群众传授实用技术、给村民群众提供市场信息、在自己的企业中优先安排村庄中的闲置劳动力等途径,给其他众多村民也提供了创收和致富的机会。

3. 有利于乡村社会管理

先富能人在经济上所表现出的出众才能和卓著成绩无疑令广大村民群众敬佩,而事实上先富能人的才能往往不只是在经济方面。通过在市场经济大潮中的磨炼和洗涤,他们积累了丰富的人脉资源和宝贵的经营管理经验。因此,如果给他们主政村庄治理的机会,他们往往也表现出高人一筹的才能,从而有利于农村基层的社会管理和社区和谐。

二、“先富能人治村”现象的形成和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先富能人在农村的崛起,凭借他们高人一筹的致富能力和令普通村民羡慕的经济实力,在农村基层社会中的影响力迅速扩大。与此同时,随着以政社合一为重要特征的农村人民公社体制的解体,以“民主选举”为基础的村